

文艺观潮

新时代·新创作·新文论

对“生态道德”的深情呼唤

——刘先平大自然文学的当代价值

□ 翟泰丰

很高兴读到刘先平长篇新著《续梦大树杜鹃王》(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7月出版),为他又一部大自然文学新出版而庆幸。人们称道他大半生勇于站在历史潮头,以新的文学题材、体裁,丰富文学的时代性;称道他年过八旬,仍然如此顽强,三登高黎贡山,拜见大树杜鹃王,续梦千年生命;称道他不辞辛劳,不惧风险,勇敢地走进原始森林,闯入猛兽洞穴,走近大自然的内心,寻觅万物共生共荣的哲理;称道他在大自然中寻求人与环境、环境与自然、自然与人之间的内在关系,并取得可观的成果;称道他对大自然文学的审美价值、中国大自然文学的发展史、大自然文学的内涵与哲理,以及大自然哲学的艰辛探索;称道他四十年来以四十余部作品,关注生态平衡,呼唤“生态道德”,已经初步形成刘先平大自然文学的审美体系和哲学理念。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刘先平的文学创作被界定为“大自然探险题材的‘儿童文学’”。的确,探险好奇、追求美妙,是儿童特有的渴望与追求。在1996年出版的《刘先平大自然探险长篇系列》丛书的自序中,刘先平也提到“探险文学在儿童文学史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认为“需要将娓娓动听的人生故事载入探险生活惊心动魄的情节中”。

读刘先平的大自然文学作品,我们能听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脚步声,听到宇宙万物生命的脉脉,感受到一切生命都在表达着爱,特别是共有的母爱。他的作品遵循动物、植物、湿地、海洋等一切物种都有生命的奇特景观。刘先平为探寻大自然中生命运动的特有规律与审美价值,不辞辛劳,长年在山野里,不顾沟深壑险、道路崎岖,走万丈黑洞,听虎啸狼嚎……

在我看来,刘先平的大自然文学创作大体上可分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中期。在此期间阅读刘先平的作品,常常是跟随着他的脚步,一同奔波,共同探险,与虎豹打游击,与猴子争夺相机,听呦呦鹿鸣,看千鸟飞翔,在山野里寻趣,在险峻中探秘。在这个阶段,他的作品在结构、样式、语言、图画和出版版式上,都具有鲜明的儿童文学特色。他激情地为大自然呐喊,歌唱它千姿百态的神奇。对爱好大自然探险的成年人读者来说,这样的作品也颇具吸引力。

第二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21世纪初叶。他的作品既保留原有风格,又展现出对大自然文学审美价值新的追求与探索,在探险中他开始注重寻觅万物生命的共同社歌。我们看到他的思想火花在不断绽放出崭新的花朵。此时,他在大自然探险中开始思索什么是大自然,什么是大自然的生命,大自然与动物、与人、与人文、与宇宙是什么关系。他给予大自然更广泛、更深刻的审美观照。这个阶段,他在作品的前言、自序里常常打问自问:是人类属于大自然还是大自然属于人类?他明确提出“大自然赋予我生命,我爱大自然如生命”的观点,提出人与大自然共生共荣的审美理念。



第三阶段是21世纪初叶至今。他曾经领略过绿水青山的美好,现在不得不为被砍伐的青山懊丧,为干涸的绿水顿足。生态的哭啼,生命的悲壮,刺痛了作家热爱大自然的悲心。作家的一腔热血在灼烧,他挥笔为大自然的悲壮命运而发出生命的呐喊!

至此,作家的笔走进大自然中一切生命的内心世界,触摸宇宙万物生命的脉搏,他深入江河湖海、森林兽穴,为万物的生存环境而感怀,为生态的严重失衡而焦虑。他以一个文学家敏锐的审美触角,在20年前就开始呼唤“生态道德”,并明确提出“生态道德”的缺失造成了生存环境的危机。在这个阶段,他总是在思考天、地、人之间自然一体的法则,认识到人与大自然谁也不依附于谁。

党的十八大以来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使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更加明确,有利于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刘先平四十多年来跋山涉水,以大自然文学作品的名义呼唤“生态道德”终于有了归宿。他喜出望外,振奋精神,三攀高黎贡山,在《续梦大树杜鹃王》中进一步查明百年前英国人福瑞斯特盗窃了我们森林中无数的珍稀物种。但偷盗者盗取不了深扎于土地的根须。而根须才是大自然的生命所在。一百年之后根须下的杜鹃又生长成了参天大树。刘先平得以再次寻觅爱到原始森林中的大树杜鹃王,这位八旬大自然探险家心中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2015年10月在大自然文学国际研讨会上,与会者对刘先平为代表的中国大自然文学界取得的成就给予高度评价,这也是对刘先平个人在大自然文学创作上取得成就的历史性认可。刘先平开创的中国特色大自然文学是一个新题材、新样式。它涉及人文与环境、环境与生态、生态环境与自然、人与大自然、大自然文学与哲学、生态道德与人际道德、法治与德治等关系。大自然文学面临的这些新课题,需要文学家站在历史潮流勇敢面对。刘先平敢于在学术问题上“探险”,剖析大自然与生态环境的内在联系,探寻天、地、人之间的奇妙关系。他称,他拜生物学家、动物学家、植物学家、史学家、海洋学家、哲学家等为师,老老实实当起小学生,专心学习。久而久之,他的知识修养更为渊博。在他的笔下,一切生物都有了生命价值。大自然文学走进了这个崭新的生命循环圈,以深邃的哲理,扣人心弦地抒发感人肺腑的故事,书写大自然文学华丽的新篇章。

刘先平的大自然文学,源于他长期沉浸在大自然之中而收获的鲜活感受,源于“道法自然”的大自然哲学,遵循“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哲理,源于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所有这一切都化为刘先平的大自然哲学,就是“大自然赋予我生命,我爱大自然如生命”,就是“我在大自然中跋涉了几十年”,其实只是在做一件事,“呼唤生态道德”。

刘先平关于“生态道德”的呼唤,揭示了人为自私之利而违背自然规律、破坏生态平衡,最后遭受大自然惩罚的苦果。刘先平建立“生态道德”的迫切愿望,发自热爱大自然的深情呐喊。这里讲的道德不是人与人之间的一般道德,而是因利益诱惑而损伤环境的人与自然之间的道德关系。老子说:“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这就是大自然与日月天地长久运动不息的内在辩证关系。

十分感谢以刘先平为代表的一批大自然文学家,走上了开拓大自然文学的时代潮流,走在了世界前列,创作了一大批优秀的大自然文学佳作。

文学应当有力地参与和推动时代进程

——作家路遥和蒋子龙当选改革先锋的启示

□ 李宗刚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改革开放铸就的伟大改革开放精神,极大丰富了民族精神内涵,成为当代中国人民最鲜明的精神标识。

广大作家凭借辛勤的创造劳动、丰富的艺术成果,在铸就伟大改革开放精神的过程中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党中央、国务院授予的100名改革先锋中,就包括“‘改革文学’作家的代表”蒋子龙和“鼓舞亿万农村青年投身改革开放的优秀作家”路遥。

40年来的文学发展历程,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作家。为何蒋子龙和路遥能够获此殊荣,成为影响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先锋人物?他们究竟对改革开放作出了哪些历史性贡献?他们的文学创作将对新时代文学发展产生怎样的示范引领作用?

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成就,在文学上的重要标志就是一些作家犹如幼苗破土而出,最终成长为参天大树。不论是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还是获得了茅盾文学奖的陈忠实、贾平凹、张炜等作家,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且不说他们能否获得世界性的认同,就是能否从容地写作都是一个未知数。而蒋子龙和路遥的一个突出共同点就是他们以文学创作的方式有力参与并推动了时代进程,成为人们回眸历史时无法忽视的重要存在。

蒋子龙的“改革文学”直接触及新时期改革最为关键的内容,尤其是触及国企改革的关键所在,由此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他的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将创作的着眼点放在人们关心的经济改革领域,成功塑造了一位锐意进取、雷厉风行、敢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企业家形象,首开“改革文学”先河。此后他陆续发表的《开拓者》《赤橙黄绿青蓝紫》《燕赵悲歌》等一系列表现工厂、城市改革的小说,对促进思想的解放,推动改革的深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当时的背景下,蒋子龙以文学形式,很好地解答了传统经济学理论难以解答的现实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改革文学”承担了心理学影响的使命,以其强大的情感影响力和审美感召力,为改革走向深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与蒋子龙关注城市改革有所不同,路遥把目光更多地聚焦在农村改革上。他以自己对农村的深刻洞察与真切体验,相继推出《人生》《平凡的世界》等重要作品。改革开放的本质在于最大限度地解放人、促成人的全面发展。路遥在《人生》中则把被传统户籍制度钳制在土地上的新一代农民满怀创造激情、渴望实现崭新生活的梦想,用文学的形式展现出来。当然,在实现人生梦想的过程中,这些已经在土地上觉醒的一代新人并非一帆风顺。但是,当改革开放的春风扑面而来时,再凛冽的倒春寒也无法阻挡已经觉醒的人的蓬勃发展。这在《平凡的世界》中得到了进一步展示。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的高加林还希冀通过谋求一份体面的城里工作获得自我发展的话,那么在改革开放走向深入的时候,孙少平则已经挣脱羁绊,开始掀起了更为深刻的社会大变革,那就是后来支撑起中国经济半壁江山的民营企业。显然,路遥在乍暖还寒时便敏锐地捕捉到了即将到来的时代巨变,再用文学的形式真切地表现了出来。

蒋子龙与路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时代的母题。“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任何特定的时代必然有其特定的文学,任何特定的文学必然有其特定的时代主题。40年来新时期文学发展进程中,改革开放最能



路遥(右)在陕北农村走访

新华社记者 张新民摄



蒋子龙 新华社记者 宋佑民摄

体现这个时代的主题。蒋子龙和路遥在文学世界中不仅揭示了这场伟大变革别无选择的必然性,而且展现了这种从人的观念到社会体制内外变革的艰难曲折、痛苦磨砺的复杂性。乔厂长的大胆变革,让我们看到了新时期走在时代前列的变革者的奋进与悲壮。尤其值得肯定的是,这种变革精神早就深潜在中国人的血液里,只不过其外在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路遥作品中的高加林和孙少平等普通人,同样以其独特的方式汇入历史的洪流之中,最终汇聚成这个时代的磅礴大潮。

蒋子龙与路遥的文学创作热情讴歌了时代精神。在新时期的改革中,永不言败的进取与愈挫愈勇的韧劲相结合,脚踏实地的劳作与美好生活的向往相结合,突破藩篱的探索与坚定不移的信念相结合,这些都是40年来能够攻坚克难、不断创造奇迹的根本所在。蒋子龙笔下的乔厂长面对行将破产的企业,凭借坚定的信念和勇于进取、大胆探索的精神,毅然决然地担当起重任,走上了引领企业重生的崭新征程。如果循着乔厂长的路子顺流而下,就会发现许多浴火重生的国有企业恰是从这里开始了艰难的蜕变。这些国有企业或通过股份制改制,或通过重组整合,最终实现了自我的否定与超越,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发展之路。至于路遥笔下的高加林和孙少平等农村青年,则乘着改革的东风,最终走出了祖祖辈辈固守着土地,汇入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成为这个伟大时代的参与者、建设者、推动者和共享者。辛勤劳动让大多数人获得自我解放的同时,也最终实现了自我的人生价值。

蒋子龙和路遥在众多优秀作家中脱颖而出,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绝非偶然。他们获此殊荣对新时代文学发展将会产生积极的示范引领作用。

作家应该深入体验生活,敏锐感应时代,成为真实反映时代巨变的“书记官”。40年的社会变革不仅是历史上变化最大的历史阶段之一,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中国用40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需要二三百年的时间才能走完的历程。然而,这段可谓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的历史巨变,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却没有得到相应程度的艺术表现。相比较而言,蒋子龙与路遥则是突出反映这一历史巨变的优秀作家。从他们的作品中,能够触摸到这段历史到底是怎样走过来的,又经历了怎样鲜为人所知的艰辛与困顿。

回眸40年来的新时期文学可以发现,有不少作家不但没有深入火热的社会变革实践中,反而在改革中迷失了自己作为人民作家的主体性,甚至放逐了文学使命,放逐了文学赖以安身立命的使命。而作家放逐文学之日,也就是读者放逐作家之时。许多作家不但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反而一味地埋怨时代,埋怨深入火热的社会变革实践中,这正是文学脱离现实的表现。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对蒋子龙和路遥的创作给予关注,是在昭示未来的文学发展方向——作家应该循着现实主义道路走下去,才有可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经典之作。

作家应该增强改革意识,拓展开放视野,讲好当代民族复兴的“中国故事”。对作家而言,文学遇到了一个好时代。这个时代呼唤作家具有社会担当,具有人文情怀,脚踏在960多万平方公里的热土上,写出能够真切地反映这个时代的巅峰之作。作家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当下我们所处的是一个改革的伟大时代,也是文学繁荣的伟大时代。关键在于,作家应肩负起时代赋予的新使命,走出自我的狭窄天地,扬弃自我玩味已久而又无法割舍的文学书写模式,与时代同呼吸,与人民共命运,由此找到作家与时代融为一体、文学创作新道路。

客观地说,新时期许多作家的确存在着一些先天不足。比如说,不少50后、60后作家,接受的文学教育有限,没有系统地阅读过全人类优秀的文明成果,特别是优秀文学经典。他们从事文学创作时偏于一隅,难以实现“气象宏大”。这就使得一些作家并不是通过文学引领时代的大潮往前

奔涌,而是跟在时代后疲疲于奔命,这种先天不足导致了文学的发展严重滞后于时代的进步。

作家应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时代努力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史诗性作品。当下,部分作家的文学书写历史参照系过于单一,历史时长短,地理空间过于狭窄,没有把真正能够代表40年改革开放历史的图景诉诸笔端,没有让胸怀世界的风雷照亮文学的星空,特别是未把文学置于历史与世界的维度加以表现。这表明一些作家没有那种能够与时代相吻合的大胸襟,未能透视历史风云际会,依然是躲在自己的狭小天地里沉吟。改革开放40年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是活生生的,是可以轻易触摸到的。像深圳从40年前的“小渔村到当今的国际大都市,像浦东从40年前的荒芜之地到当今的世界性金融中心,一些有名的企业从无到有而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光彩,这在富有想象力的作家那里都难以虚构出来,但在当今世界已经变成了现实。当然,蒋子龙和路遥也没有建构起“中国的深圳”或“上海的浦东”等文学地标,但他们所走的文学道路是通向这样更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地标。如果用这样的标准历史地看待,蒋子龙和路遥在其所属的时代,用文学的方式书写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乔厂长那种既脚踏实地又满怀激情的激越人生,恰是40年最恒久的人生基调。虽然时代改变了,但不变的是那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亮剑”精神。试想,中国成功的企业家哪个不具有这种精神?孙少平那种既坚韧又负重又勤力前行的铿锵人生,同样也是40年来最恒久的人生基调。社会发展了,但没有改变的依然是这种久久为功的勤奋精神。试想,中国从乡村走出来的新城市人哪个不兼具这种精神?这种精神恰是植根于民族文化深层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人文精神的现代性转换。

当选改革先锋的蒋子龙和路遥,是新时代语境下作家们学习的楷模。蒋子龙和路遥用文学的方式,脚踏实地地创造出属于他们那个时代的经典之作。新时代的作家们应该像他们那样,与时代发展同步,与社会需要合拍,仍然保持一往无前的变革和开放精神,在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努力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新的伟大作品。

（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共和国教育与当代文学”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全国公安文联副主席）

张策

袁瑰秋这部《忠诚誓言》(群众出版社2018年7月出版)体量不大,内容却如同山海,博大且厚重。它不仅是作者个人创作生涯中的一次突破,也是公安文学创作的一种范本。

公安文学是一种职业文学,也可称一种战线文学。前者,是不带感情色彩的类别标注;后者,却是洋溢着火热激情的褒扬。时至今日,能称之为“战线”的,必然是凝聚着一种独特的精神,聚集起一支坚强的队伍,在事关国家命运的前沿执着坚守的群体。而且,“战线”的精神内涵,甚至已经超越了群体的概念而上升为一种理念。如说公安战线,就并不仅指穿着警服的我们,而是有关国家公共安全领域的方方面面,既是钢铁长城上的一块基石,也是整个钢铁长城。

在这样的战线上孕育出的文学,是在血与火的斗争中锻造出的文学。说起公安文学,必然与滋养了自己的文学土壤,以自己的描写与歌颂的对象息息相关。因此,也必然在形式上产生出具有公安战线自身特点的独特文学样式。袁瑰秋这部作品,具备着报告文学的诸多特征,却也充分展现了另一种风采,它是别具一格、激情澎湃、如诗如歌的特殊文学符号。

也许,这是只有公安战线才会有的文学。也许,这是被某些人认为不是文学的文学。确实,很多人对宣传功能较为鲜明的文本不太关注,但他们忽视了文学不可能不具备社会效应和宣传效应的重要特征,其实这是对文学的一种偏见。而近年来,一种文学形式在公安战线生机勃勃,诸多艺术形式与科技手段有机融合,构成了丰富多彩、情感充沛的艺术表现形式。多数人将之称之为情景报告,我却愿意称之为公安文学的跨界。因为,它的基础是文学,是公安文学,是公安文学作家们在自己的战友英雄事迹的感召下,以笔蘸泪创作出的文学新篇章。

在这种文学形式的发展成熟过程中,涌现出了一批擅长此类文学创作的优秀公安作家,袁瑰秋即是其中之一。她长期坚持文学创作,以散文踏上文学之路,继而从事报告文学的写作。她的文字充分体现了女性作家细腻、情感丰富的特点,也处处展现了她从事公安文化工作所打下的深刻思想印记。因此,几乎是一种必然,近年来她涉足了多场情景报告脚本的创作,也从这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在细腻中见坚强,在柔情中现风骨,是这种独特的创作锻炼了袁瑰秋,也可以说是袁瑰秋的个性丰富了这种创作。这部作品是在地为广东省公安厅2017年先进事迹报告会所拟脚本的基础上修改而成,充分体现了这种文学特性。翻阅这部作品,你能看到英雄的事迹,看到警队的荣耀,也能看到作家采访的奔波,看到创作团队呕心沥血的创作过程,也可以窥见作家灵魂上的震撼与感动。

袁瑰秋在她的作品中回顾了自己的创作过程和心路历程。当采访结束,创作结束,演出结束,曾经的轰轰烈烈过去,舞台上的灯光熄灭了,她感慨道:一页历史已悄然翻过……短短的一句话,流露的是她的眷恋,是她的记忆,是苦辣酸甜在心底的沉淀。其实,我们都知道,历史不会悄然翻过,每一场英雄事迹报告会都会在人们的灵魂上烙下一道印记,它已经把忠诚和奉献永远留在了人们心中。这是袁瑰秋和她的战友们的成就,这是公安文学的神圣使命。